

公元三至九世纪四川手工业的发展

傅 正 初

通过考古发掘,大大丰富了我们对于四川地区三至九世纪社会生产情况的认识,本文拟就现有考古资料,结合有关文献记载,对四川地区手工业经济的发展情况谈谈个人的管见。

一、璀璨的蜀锦

蜀锦,是我国著名的传统丝织手工业品。它织造精致,质地坚韧、厚重,图案丰富,色调鲜艳,对比性强,彩条与锦群浑然一体,既富于民族特色,又别具地方风格。蜀锦的发展,与四川地区发达的蚕桑种植和丝织生产息息相关。

我国是世界上发展养蚕、缫丝、织绸的最早国家,四川又是我国发展蚕桑和丝织生产最早地区之一。四川古称“蜀”,“蜀”字,最早见于殷代的甲骨文。象虫形。《说文》:“蜀,葵中蚕也,从虫,上目象蜀头形,中象其身蜎蜎”。葵,《尔雅音义》说它就是桑;《释文》和《玉篇》也说“蜀”是“桑中虫”。总之,“蜀”与蚕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古代的四川,可能正是因为种桑养蚕业的发达,才被人们称为“蜀”。

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以张仪、司马错伐蜀,在统一巴蜀后,即于当地置锦官,统一管理织锦业。汉代四川织锦的生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当时织锦中心在成都,扬雄《蜀都赋》形容蜀锦的美丽:“尔乃其人,自造奇锦”,“发文扬采,转代无穷”。

东汉末年,中原地区战乱频繁,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而地处西南一隅的四川虽然也受其影响,但相对安定,因此蜀锦生产得以继续发展。三国鼎立,织锦为蜀国军资所赖。正如《诸葛亮文集》卷二指出的:“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魏、吴两国所需之锦也输自蜀国。南朝刘宋人山谦之在《丹阳记》中说,其锦“成都独称妙,故魏则市于蜀,吴亦资西蜀。”南北朝时期,四川成为全国仅有的织锦产地,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唐初。朱启钤《丝绣笔记》记载:“魏晋以来,蜀锦勃兴,几欲夺襄邑之席,于是襄邑乃一变而营织成,遂使锦绶专为蜀有。”

唐代,四川地区的织锦手工业无论织造工艺和发展规模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四川的丝织贡品,对于唐政府的财政经济起了重要的作用。据《新唐书》记载,四川向唐皇室贡锦的地区,除原来的成都府蜀郡外,又增加了蜀州唐安郡(今崇庆县)和绵州巴西郡(今绵阳县)。蜀锦织造工艺的进步,新品种不断出现,以写实、生动的花鸟图案为主的装饰题材和装饰图案,形成了绚丽多彩的时代风格。

中国的锦,最先出现的大概都是经线显花的锦,即用一组纬线与两组经线交织而成。自南北

朝起，渐渐出现纬锦，是以两组纬线与一组经线交织而成。纬线起花受织机的限制较小，大大增加了织物色彩的变化，丰富了织物纹样的内容。唐代蜀锦，从考古发掘品来看，都是以纬线显花为主。

在唐代“丝绸之路”沿途旧址，考古发现了许多古代从内地运去的丝织遗物，如锦、丝包、丝带、绢画、垫褥等。其中吐鲁番发现的织锦中很多具有唐代蜀锦的风格特点^①。例如，联珠禽兽纹斜纹纬锦是当时这个时期其它纹锦所不可比拟的，发现的数量比同时期其它纹锦的数量总和还多。出土量仅次于上述纹锦的是在经斜线上织出类似莲花的花茶和四出的忍冬相间的团花锦。这两种纹锦的图案、地色、锦背面纹样的清晰程度等，都和相传的蜀江锦相似，是唐代蜀锦的一种新产品。阿斯塔那墓出土一件唐开元九年（公元721年）的晕间提花锦裙，是彩条纹锦，使用黄、白、绿、粉红、茶褐五色经线织成，然后再于斜纹晕色彩条上，以金黄色纬线织出柿蒂形小团花，这是第一次考古发现的“锦上添花”锦，也是第一次发现的晕锦。阿斯塔那墓还出土了一双锦鞋，鞋里是衬蓝、绿、浅红、褐、蛋青、白六色丝线织成彩条花鸟流云平纹经锦，其中，蓝、绿、浅红三色施晕^②。这些彩条纹锦，也具有蜀锦的某些风格。在吐鲁番出土的丝织物中，还有来自四川的“双流折绸绫”，绫起暗花，是唐睿宗景云年间（公元710年至711年）的产品。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梓州小练”的记载，并说明了当地帛练规定其价格为：上等匹值钱三百九十文，次等三百八十文，下等三百七十文^③。从考古发掘来看，蜀锦在当时除了作贡进纳宫廷之外，还有相当部分作为商品运销国内少数民族地区及其它国家。上述吐鲁番发现的蜀锦丝物，大都是作为商品从四川辗转贩运到西域的。

“陵阳公样”是唐代蜀锦的典型纹样。唐人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卷十中记载：“窦师伦字希言……封陵阳公，性巧绝。草创之际，乘舆皆阙，敕兼益州大行台，检校修造。凡创瑞锦、宫绫，章彩奇丽，蜀人至今谓之‘陵阳公样’。……高祖、太宗时，内库瑞锦对雉、斗羊、翔凤、游麟之状，创自师伦，至之传之。”长安官办“织染署”织造的瑞锦、宫绫，纹样大都取法于“陵阳公样”。唐代宗时，禁止外地织造的大张锦、独软锦、瑞锦以及盘龙、麒麟、狮子、天马、辟邪、孔雀、仙鹤等纹样，也多出于“陵阳公样”。蜀锦“陵阳公样”在西域仍然也有发现，《新疆出土文物》一书图版一五五是一件完整的“联珠龙纹绮”，其纹样主体是球路横立式有轴线相对均齐式双龙纹，宾花则是典型的圆心小球路绶带莲花，这种纹样属于“陵阳公样”^④。

蜀锦作为传至国外的唐代织锦代表，也是蜀锦发展的一个标志。日本正仓院和法隆寺藏有“蜀江太子御绢伞”、“蜀江小幡”等许多唐代蜀锦的赤地经锦残片，这些锦纹样众多，有龟甲花、格子花、团花、连珠莲花和连珠对禽对兽等等。另外，唐代流传到日本的《唐人小说》“游仙窟记”，也提到“益州新样锦”（即“陵公纹样”锦）。

通过上述事实，说明在魏晋南北朝至唐期间，特别是唐代，四川地区的蜀锦手工业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明显的发展。当时蜀锦手工业的发展，与其社会政治、经济诸因素有关，尚待另文详加探讨。

二、长足长进的陶瓷业

瓷器同丝织品一样也是我国古代人民的一项伟大发明。考古发现证明，我国商周时期已经出现原始瓷器，到了东汉后期瓷器已普遍生产，南方的青瓷达到真正瓷器的要求，距今已有一千八

百多年^⑧。

根据现有考古资料说明,四川烧制瓷器的年代始于东汉后期^⑨。三国至两晋时期,四川青瓷生产的造型种类逐渐增多,装饰更加丰富。两晋以后,青瓷质量显著提高,制瓷工艺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炼丹术的发达,积累了丰富的关于物质变化的经验,化学工艺的发展必然影响到瓷器的釉、胎原料的配制,人们对于火焰改变物质性能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鼓风设备的发展,水碓的推广,为烧窑工艺的提高和制瓷原料的粉碎加工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四川成都、邛崃、新津、金堂、双流等地都有两晋至南朝的青瓷窑址发现;德阳、广元、绵阳、昭化、彰明、涪陵、重庆、忠县等地墓葬多出土有两晋至南朝时期的青瓷器。从墓葬随葬的青瓷器来看,器物多是日用器皿,与汉代器形无甚变异,制瓷工艺上表现出造型浑厚、花纹简单、釉色莹润的风格。南朝以后,四川地区随葬青瓷器皿,日益增多,反映出青瓷工艺在这一时期的发展。无论器物类别和造型与花纹装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器物类别除生活用器罐、壶、碗、杯、盘、钵等外,新增了文房四宝和三足香炉等。在器物造型上,器身逐渐变得修长;为改进釉面光亮度,釉下已普遍使用化妆土。器物的花纹装饰,以莲花为题材的纹饰广泛流行。邛崃什方堂窑出土的盘口四系壶,花纹装饰在腰部施青釉,而后用黑彩绘,这在黑彩彩的工艺上,开创了用笔绘黑彩的装饰新工艺。隋代瓷器生产在手工业经济中地位日趋重要。四川地区发现的青瓷窑址遍及川西、川南。从考古资料来看,这时虽仍以单色青瓷为主,但出现了灰白釉下饰黑色联珠纹饰的工艺方法,为唐代釉下彩的发展开创了先路。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期政治、经济、文化最繁荣的时期,瓷器手工业又由于唐帝国为铸钱禁用铜器以及唐中期以后盛行饮茶之风,瓷的茶具需要量增加,加之对外贸易中瓷器所占重要地位等国内外各种因素而得到充分的发展。

四川的成都、邛崃、新津、灌县、华阳、郫县、双流等地都有唐代窑址,川南和川东等地也发现唐代窑场。大规模窑址的发现,说明四川地区制瓷手工业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

唐代四川青瓷窑中的产品,最具代表性的是邛崃县的邛窑^⑩。窑址有邛崃县的固驿、什方堂、尖山子等处。邛窑始烧于南朝,唐代盛烧与长沙窑产品相似的青釉褐绿色彩器,是南方地区著名的青瓷窑之一。邛窑窑床为斜坡长条形的龙窑,窑具中除常见的匣钵、锯齿形支垫,支钉等外,还有一种环形托板,此种窑具仅在四川发现的唐宋窑内见到,具有地方风格。邛窑的主要产品为常见的碗、盘、杯、碟、壶、罐、钵等日用器皿,还有大量的动物玩具等瓷塑。从工艺上来看,邛窑产品胎色呈灰色或土黄、朱红,除在青釉下施褐绿、黄、蓝等彩外,无其它装饰。纹饰有刻花、印花、划花和绘画等,并以绘画为主。在纹饰上最大的特点是釉下三彩,为了与北方当时的低温唐三彩相区别,称为“邛三彩”。它是在米黄色或灰白色釉下,用绿、黄、褐三色绘成图案画、大写画、散点画和斑块纹等,用高温一次烧成。邛三彩釉面平整,具有彩绘永不脱落的效果。由于邛三彩瓷器质量上乘,美观实用,历代为文人墨客所称颂,影响极大,誉满中外。元代诗人吴莱所作《大食瓶》诗,称颂波斯瓷器时,即有“定州让巧薄,邛邑斗轻坚”之句。定窑是我国北方最著名的窑场之一,诗人以定窑和邛窑作比,可见邛窑产品非一般了。邛窑青瓷系的邛三彩,是我国陶瓷发展史釉色使用上的重大突破,这种一次高温烧成的釉下三彩,比起北方的低温斑块釉上唐三彩是一个进步,它为后来的釉下高温彩即青花瓷器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邛窑产品是四川古代青瓷窑系的代表性产品,因而在四川陶瓷手工业史上得以长时间的繁荣和发展。唐以后,虽然邛窑有所衰落,但类似邛窑的产品在成都青羊宫、华阳、灌县、金堂等地的

窑场中都有发现。

唐代四川陶瓷业的发展除了在青瓷生产上有所表现外，还表现在白瓷的生产上。杜甫有诗曰：“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遗憾的是，虽然杜甫有诗咏大邑白瓷，但至今还未发现窑存遗物，使我们无法目睹其“轻且坚”、“胜霜雪”的风采。我们相信，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定会有机会一睹其风采。在彭县磁峰场发现有晚唐至宋代的白瓷窑址，这是四川地区已发现的唯一白瓷窑场，它属于定窑型，其造型、釉色、纹饰都与定窑产品相似，反映出北方制瓷业对四川地区的影响。要发展地方陶瓷手工业，既要具有丰富的地方资源，又要有传统经验，还要吸收外地先进技术，不断改进创新。三至九世纪四川陶瓷业的发展，正说明了这一点。

三、发达的造纸、印刷业

我国是造纸术的故乡。早在西汉就已出现用麻植物纤维造纸^④。自汉代以后，纸已代替帛、简之类，成为普遍的书写材料。

四川地区的造纸手工业历史悠久。何宇度《益部谈资》说：“蜀笺，古已有名，至唐而后盛，至薛涛而后精。”由于考古发现中尚未见到四川地区唐以前的造纸实物资料，我们这里着重谈谈唐代四川造纸业的情况。

根据文献记载，蜀纸的特色为重厚，上品选料必用纯麻。费著《蜀笺谱》云：“以木肤、麻头、敝布、鱼网为纸，自东汉蔡伦始，今天下皆以木肤为纸，而蜀中乃尽用蔡伦法。笺纸有玉版、有贡余、有经屑、有表光。玉版、贡余杂以旧布、破屨、乱麻为之；唯经屑、表光非乱麻而不用。”又云：“吾蜀西南，重厚不浮。故物生于蜀者，视他方为重厚。凡纸亦然，此地之宜也。”唐代四川制造的麻纸，正是重厚、坚实、细密，深得当时人们的喜爱。

麻纸是当时的主要用纸，有白麻纸、黄麻纸、五色麻纸等多类品种，其产量相当可观。唐玄宗时，仅每月发给集贤书院四川产的麻纸数量就达五千番之多。朱长文《墨池编》说：“蜀中多以麻为纸，有玉屑、屑骨之号；江浙间多以嫩竹为纸；北地多以桑皮为纸；剡溪以藤为纸；海人以苔为纸；浙右亦以麦箬为之者，尤脆薄焉。”这说明蜀地所产纸张与江浙等地所产纸张的区别，故蜀麻纸蔚为大观。

蜀中造纸中心，历代皆在成都浣花溪上。《艺文类聚》记载：“成都浣花溪造纸光滑，以玉笺名。”《志林》云：“成都浣花溪水，清滑胜常，以沤麻楮作为笺纸，紧白可爱，数十里外便不堪造，信水之力也。”蜀纸的光滑紧白，正是受水性影响的缘故，所以造纸者多是沿这条溪边。《梁益记》载：“浣花溪水居人多造彩笺”。《蜀笺谱》曰：“府城之南五里有百花潭，支流为二，皆有桥焉。其一玉溪，其一薛涛，以纸为业者家其旁。锦江水濯锦益鲜明，故谓之锦江。以浣花潭水造纸故佳，以其水宜矣。江旁凿臼为碓，上下相接，凡造纸之物，必杵之使烂，涤之便洁，然后随其广狭长短之制以造研，则为布纹、为绫绮、为物花木、为虫鸟鼎彝，虽多变亦因时之宜也。”据闻，曾在锦江大桥之北，出土大石碓十七，且有木柱木板遗迹，或即造纸作坊之旧址。

印刷术和造纸术一样，也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独创发明。作为人类文明史上划时代的雕版印刷术的问世，是与隋唐时期经济文化发展的形势相适应的。从现存最早文献和最早的印刷实物来看，有理由相信我国雕版印刷术是在公元七、八世纪之间，即唐朝前期（唐玄宗天宝年以前）出

现的。

现存文献中最先明确提到印刷的,是唐文宗大和九年(公元836年),唐文宗下令禁止各道私置日历版。这是根据当时东川节度使冯宿的奏请而下令的。冯宿在奏章里说:“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日历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⑩由此可见,当时已有印刷的日历,并且在现在的陕西南部、四川、江苏和安徽一带已有人从事印刷手工业了。

四川是当时全国印刷业发展的最早地区和中心之一。早期的印刷业主要在民间作坊。当时成都刻书处现在可考的有:西川过家;西川成都樊赏家;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下家。印刷的内容有:宗教典籍、文学诗集、音韵字书、历法和医药等科技书籍及其它。唐末成都印刷书籍中,有《金刚般若波罗密经》、《陀罗尼经》等佛教经典;还“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⑪。也有很多“术数、字学、小学”之书。1944年在四川成都望江楼附近唐墓中发现了印本《陀罗尼经咒》^⑫,它是在一张31×34厘米的半透明薄蚕纸上,中央刻一菩萨像坐于莲座之上,六臂手中各执法器,栏外刻经咒文,咒文外又雕双栏,栏中刻菩萨像及供品一圈,右边栏外还刻着:“**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近下□□印卖咒本……”等字。此印本虽不如《金刚经》精致,但整个说来还是较成熟的雕印作品。特别是由于刻写了印造地点,更可证明文献记载成都为唐代印刷业中心地区的说法完全是事实。

四、独特的井盐开采

根据四川地质科学资料分析,在一亿八千五百万年以前的中生代三叠纪时代,四川盆地被沟通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古地中海海水所淹没,后来经过许多次海浸和海退作用,便产生了盐卤和盐岩。在一些地质构造上适合于集中这些盐卤和盐岩的特殊岩层,便形成了产盐区^⑬。

对四川井盐的认识和利用,是从岩穴深处流出来的自然盐泉和偶然露出地表的盐岩开始的。《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连然县有盐泉,南中共仰之。”《蜀志》也记载:“定笮县有盐池,积薪以齐,水灌而后焚之成盐。”《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记载,汶山“地有碱土,煮以为盐,羸羊牛马食之皆肥。”在认识和利用自然盐泉和盐岩的过程中,逐渐开始了对浅层地下盐卤凿井取卤的井盐开采。《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识齐水脉,穿广都盐井渚陂池,蜀于是有养生之饶焉。”这是我国历史上开采井盐的第一次记录。根据文献记载,秦国蜀守李冰是四川井盐最早的开拓者之一。井盐的开采,是我国盐井史上的一次重要革新,它对于增加财政收入,促进经济发展,起了突出的作用。

从秦汉时期开始的井盐开采,直至东汉时期,从技术上来看,凿井盐溉都属于大口浅井。人们不仅能开采自然盐泉、盐岩所标示的地下盐卤,而且也能开发没有自然盐泉、盐岩标示的地下盐卤。《蜀中广记》卷十九记载:“神尝刺史荆州,溯江至此,息于南起寺,谓人曰:江北二、三里间安得有宝气耶?……至涂山,见白鹿饮泉,曰:宝气在此矣。土人从所指处凿磐石而得盐泉。”这一记载虽含有神话色彩,但它曲折地反映出当时人们对地质学和地下盐卤知识的进一步认识。大口浅井的出现,使井盐产地不断增多,井盐产量也随之提高。东汉时期,在大口浅井开采中出现了简单的机械提卤,这在四川地区出土的汉代画像砖上有明确的井盐开采记录^⑭。

东汉以后,大口浅井型盐井逐渐向深度发展。《舆地纪胜》卷一百六十七记载,在晋永康元年,四川盐井已凿至三十丈深。至隋唐时代,凿井深度更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唐《元和郡县志》记载,时

陵井(今仁寿县境)深八十丈。凿井深度的发展,标志着井盐开采工艺技术的提高。因此,隋唐时期四川地区的井盐产量有了长足的提高。

井盐开采工艺技术的发展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开采自然盐泉到开采浅层盐岩的大口浅井型的出现经历了秦汉至东汉时期。到南北朝时期,发明了木制井筒。《水经注·江水》记载,南浦县两口盐井“以木为桶,径五尺,修煮不绝”。其后夔州盐泉井也采用了这一新技术(《太平寰宇记·山南东道夔州》条有记载)。木制井筒的出现,可以说是以后先进的筒井开采的最早雏型。至唐末五代出现了筒井。宋《玉壶清话》卷三记载:“……其井上土下石,石之上凡二十余丈,以榧楠木回面销叠,用障其上,土下即盐脉,自石而出。”地表以下二十余丈使用榧楠木构成木制井壁,连接深井卤层,使深层井盐的开采成为可能。宋代的井盐开采的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技术革新——卓筒井。它是钻井技术从大口浅井向小口深井过渡的标志,不仅为四川井盐生产的发展开辟新的途径,而且创造了现代盐井、油井和气井的雏形。

以上限于篇幅,本文仅就四川地区公元三至九世纪手工业的发展情况作了比较粗略的叙述,由于考古资料有限,加之文章未全面反映整个手工业经济中各个部门的情况,难免挂一漏万,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注释:

- ①④ 新疆博物馆:《新疆出土文物》,文物出版社,1975年。
- ② 《文物》,1972年3期。
- ③ 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所藏“大谷文书”3097号和3066号。
- ⑤ 叶宏明、曹鹤鸣:《关于我国瓷器起源的看法》,《文物》1978年10期。
- ⑥ 陆良德:《四川新津县堡子山岩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8期。《大邑县“马王坟”出土东汉青瓷罐说明》,《四川陶瓷史资料》第一辑。
- ⑦ 魏西尧:《邛窑》,《风土什志》,1948年2卷2期。
- ⑧ 潘吉星:《关于造纸术的起源》,《文物》1973年9期。
- ⑨ 《全唐文》卷六百二十四;《册府元龟》卷一百六十。
- ⑩ 范摅:《云溪友议》,卷一。
- ⑪ 冯汉骥:《记唐印本陀罗尼咒文的发现》,《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5期。
- ⑫ 《四川盐矿的成因》,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
- ⑬ 《四川汉代画像砖艺术》,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8年。